资源科学
第45卷 第2期 2023年2月 2023,45(2):375-387
Resources Science
Vol.45, No.2 Feb., 2023

引用格式:苏明明, 王梦晗, 余景娟, 等. 遗产旅游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的影响: 以哈尼梯田为例[J]. 资源科学, 2023, 45(2): 375-387. [Su M M, Wang M H, Yu J J, et al. Influence of heritage tourism on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Hani Rice Terraces of Yunnan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2): 375-387.] DOI: 10.18402/resci.2023.02.11

遗产旅游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的影响
——以哈尼梯田为例

苏明明[1],王梦晗[1],余景娟[2],靳 敏[1]

(1.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 成都市新都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成都 610599)

摘 要:【目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持续改善是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宗旨。【方法】本文以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所在的云南省元阳县大鱼塘村、箐口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纳入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访谈法与数理统计法对居民福祉水平进行测度及对比分析,并探析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结果】①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间福祉水平差异较大,福祉水平最高值为0.85,最低值仅为0.23,均值为0.56。②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业、家庭年收入、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对居民福祉水平产生显著影响。③经济条件变化感知、生活环境变化感知和保护与发展变化感知对遗产地居民福祉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关系变化感知、教育资源变化感知和健康安全变化感知对遗产地居民福祉影响不显著。【结论】地方政府在推动旅游发展的同时,有必要引导旅游相关生计方式融入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提高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社区参与水平,努力实现旅游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居民福祉改善的共赢。

关键词:居民福祉;遗产旅游;农业文化遗产地;熵值法;卡方检验;哈尼梯田

DOI: 10.18402/resci.2023.02.11

1 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其概念源于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1],并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视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2]。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以优越的乡村生态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乡村景观作为资源禀赋的新型旅游业态,具有经济、社会、环境等复杂影响[3,4]。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遗产地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自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然而随着遗产旅游地开发进入成熟期,大量游客的涌入和外来投资商的参与,产生旅游利益的漏损和"旅游飞地"现象,进而影响区域居民福祉[5]。因此,本文基于居民个体视角,探析遗产旅游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的影响,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福祉是衡量人们总体良好生活状态的理论框架[6],国内外学者对居民福祉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①居民福祉概念内涵探讨。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者们对于福祉概念的阐释由过去单一的经济收入转向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美好生活愿景[7-10];②居民福祉指标体系构建。居民福祉一般划分为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主观福祉基于社区居民的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11-13],而客观福祉更多展现的是社区居民生活所必须的经济物质条件,如健康、教育、收入、生活、社会关系等方面[14-16];③居民福祉实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如黄志刚等[17]

收稿日期:2022-07-25 **修订日期**:2022-12-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YJCZH134)。

作者简介:苏明明,女,北京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遗产旅游、社区参与。**E-mail:** smm52@hotmail.com

通讯作者:靳敏,女,辽宁丹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管理、社区参与。**E-mail:** jinmin@ruc.edu.cn

以典型旅游扶贫村为例，探析乡村旅游征地对失地农户多维福祉的影响；李鑫远等[18]从微观农户视角出发，分析生态移民作用下农民福祉的影响因素。

而旅游目的地居民福祉问题逐渐成为旅游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目前学术界在旅游对居民福祉的影响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研究内容上，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福祉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19-22]，也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会产生消极影响[23-26]；不同背景特征的居民福祉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6,27]。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学者们借助数理统计模型探讨旅游发展对民生改善的影响，如赖斌[28]以民族地区为研究案例地，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综合分析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民生感的影响机理。在研究区域上，一些学者从国家或省域等宏观尺度对旅游民生效应开展了相关研究，如朱麟奇等[29]以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从时空角度分析其旅游业发展与民生福祉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居民福祉、旅游对居民福祉影响的研究视角丰富多样、研究方法科学多元、研究内容逐级深化，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区、贫困区等地区，而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研究鲜少见诸文端；其次，较多学者主要从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教育、健康安全5个维度构建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而基于保护与发展背景下的居民福祉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考虑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殊性，在传统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教育资源、健康安全维度之外，将保护与发展维度纳入居民福祉评价框架，包括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以及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3个指标，以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梯田大鱼塘村、箐口村为实证对象，通过与其他案例研究对比探析，检验该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以期为发展遗产旅游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提供理论依据与对策建议。

2 研究区、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概况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核心区在云南省元阳县，按照《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确定范围，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为461.04 km²，其中，遗产区面积166.03 km²，涉及18个行政村82个自然村；缓冲区面积295.01 km²，涉及26个行政村171个自然村。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红河哈尼梯田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成功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实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本文选取的具体案例地为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下的大鱼塘村、箐口村2个自然村（图1）。它们均位于元阳县红河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是知名度较高的民俗文化村。大鱼塘村有92户410人，村委会距离游客接待中心2.7 km，是集娱乐、休闲、餐饮住宿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村，传统建筑、民风民俗文化保留完整，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称号。在实地调研期间，大鱼塘村内有2家餐馆、2家客栈和2个小吃摊营业。箐口村有238户1009人，是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的门户，村委会距离游客接待中心1.2 km。2003年，箐口村成为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第一个政府支持开发旅游并收取门票的民俗文化村景点，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一度曾是哈尼梯田旅游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但受哈尼小镇等周边景点的改造与旅游开发影响，箐口村的旅游地位逐渐被替代，近5年箐口村内游客大幅减少。在调研期间，整个村内只有1家餐馆和若干个小吃摊营业，其他餐馆、客栈、旅游商品店均已经停业，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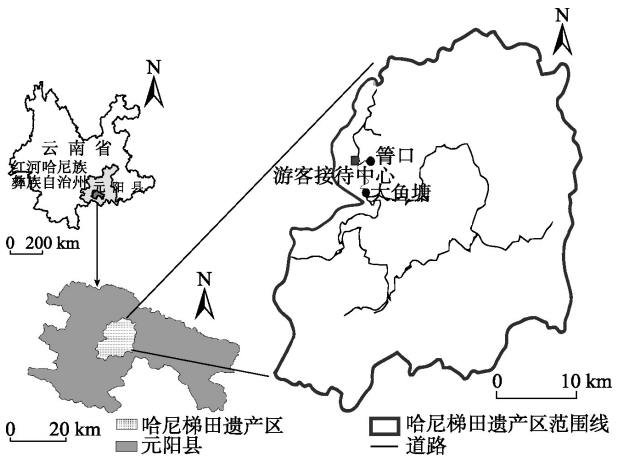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域位置图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内旅游收入大幅下降,村内居民旅游参与度大大降低。

2.2 指标体系构建

为系统地表征社区居民福祉水平,本文基于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人类福祉概念,即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安全、自由选择权5个要素,参考以往旅游地居民福祉的研究成果[18,20,21,27],并考虑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殊性,从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教育资源、健康安全、保护与发展6个维度构建遗产地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表1)。①经济条件采用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来表征,包括年人均收入、收入来源多样性和家庭收入满意度。其中家庭收入满意度越高,居民主观福祉越高[27];②生活环境采用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的满意度、基础设施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来表征,以上满意度越高,居民福祉水平越高[31];③社会关系采用社区管理满意度和家庭及邻里间关系满意度来表征;④教育资源由教育资源条件满意度和学费负担程度满意度2项指标来体现;⑤健康安全包括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满意度、医疗卫生条件满意度、医疗费负担程度满意度和治安状况满意度4项指标;⑥保护与发展包括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和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3项指标。作为具有高度自然和文化资源依托度和社区粘性的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紧密关联[2,4],当地旅游发展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当地居民持续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并维系传统农业支撑下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水平不仅仅与当地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教育资源、健康安全相关,居民对本地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和传统文化保护状况的评价和满意度,对本地个人发展机会的评价,以及对本地旅游发展情况的满意度都会影响居民福祉水平[30,31]。

表1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well-being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ites

福祉维度	福祉指标	综合权重
经济条件	年人均收入*	0.11
	收入来源多样性*	0.01
	家庭收入满意度	0.04
生活环境	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的满意度	0.03
	基础设施满意度	0.01
	居住环境满意度	0.02
	总体生活满意度	0.03
社会关系	社区管理满意度	0.04
	家庭及邻里间关系满意度	0.04
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条件满意度	0.05
	学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0.06
健康安全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满意度	0.02
	医疗卫生条件满意度	0.04
	医疗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0.04
	治安状况满意度	0.01
保护与发展	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	0.02
	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	0.04
	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	0.03

注:*表示客观福祉,其余均表示主观福祉。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团队于2020年8月19—29日在大鱼塘村、箐口村开展实地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研究数据。本次调研共完成48份问卷,其中大鱼塘村30份,箐口村18份,并对参与问卷调查的48位居民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剔除无效信息后整理得到居民访谈文本4万字左右。

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年龄方面,受访居民年龄跨度从15~82岁,以青、中年人为主。性别方面,受访居民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占到了83.33%,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收入方面,当地农户家庭年总收入集中于8万元以下,占到了81.26%,当地整体收入水平不高。家庭收入来源种类方面,根据当地情况,将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大致分为外出务工收入、本地工资性收入、务农收入、出租住房农田等租金收入以及其他收入5种,家庭收入来源为2种的居民占比最多(58.33%);未参与旅游业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参与旅游的家庭收入来源相比更丰富。

2.4 熵值法

熵值法是利用信息熵测算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综合评价多指标系统的方法,能够解决多指标加

表2 样本基本信息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特征	分类	频数	占比/%
年龄/岁	15~25	8	16.67
	26~35	13	27.08
	36~45	12	25.00
	46~55	5	10.42
	56~65	6	12.50
	>65	4	8.33
性别	男	26	54.17
	女	22	45.8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8	58.33
	初中	12	25.00
	中专技校	3	6.25
	高中	4	8.33
	大专或本科	1	2.08
家庭年收入/万元	<3	14	29.17
	(3, 5]	11	22.92
	(5, 8]	14	29.17
	(8, 10]	4	8.33
	>10	5	10.42
收入来源种类数	1	8	16.67
	2	28	58.33
	3	8	16.67
	4	4	8.33
是否参与旅游业	是	19	39.58
	否	29	60.42
未参与,未来是否有意愿参与	是	18	62.07
	否	11	37.93
参与了,未来是否愿意扩大规模	是	15	78.95
	否	4	21.05

权核算的问题,可保证评价结果客观性[32,33]。居民福祉涉及多个测量指标,需要对权重进行计算从而得到居民福祉的变量值,熵值携带的信息量越大,则不确定性越小,熵值越小。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采用极差方法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T_{ij}=\frac{x_{ij}-\min x_{ij}}{\max x_{ij}-\min x_{ij}} \quad (1)$$

式中:T_{ij} 为第 i 个居民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x_{ij} 为指标的原始数据,表示第 i 个居民第 j 个指标的数值;$\min x_{ij}$ 、$\max x_{ij}$ 分别为第 i 个居民第 j 个指标的最小值、最大值。

其次,基于公式(2)确定指标的权重值。

$$y_{ij}=\frac{T_{ij}}{\sum_{i=1}^{m}T_{ij}},\ i=1,2,\cdots,m;\ j=1,2,\cdots,n \quad (2)$$

式中:y_{ij} 表示第 i 个居民第 j 个指标值的权重;m 表示居民个数;n 表示指标个数。

再利用公式(3)计算指标熵值。

$$e_j=-k\sum_{i=2}^{m}y_{ij}\ln(y_{ij}),\ k=\frac{1}{\ln m} \quad (3)$$

式中:e_j 表示指标熵值,$0\leqslant e_j\leqslant 1$;$k$ 表示样本参数。

然后,利用公式(4)确定单个指标的总权重。

$$w_j=\frac{g_j}{\sum_{j=1}^{n}g_j},\ g_j=1-e_j \quad (4)$$

式中:w_j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总权重;g_j 表示第 j 个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最后,利用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和归一化数据值计算居民福祉水平,计算公式为:

$$FZ_j=\sum_{j}^{n}w_jT_j' \quad (5)$$

式中:FZ_j 表示居民福祉水平;T_j' 表示第 j 项评价指标的归一化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居民福祉测度和对比

3.1.1 居民福祉测度

如图2可知,居民之间福祉水平差异较大,福祉水平最高值为0.85,最低值仅为0.23,均值为0.56。通过访谈分析发现,旅游发展的参与水平和获益程度成为居民福祉差异的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其中,福祉最高的13号受访居民是来自大鱼塘村的经营着一家客栈的39岁男性。该居民利用自家的房子经营一家客栈8年,客栈位于大鱼塘村干道上,接待设施比较完备,同时他还在外承包工程,家庭收入来源多样且家庭年收入10~20万元,其中旅游收入占比70%,在当地属于比较高的收入水平。可见,旅游发展给该农户带来显著的生活改善,较大幅度地提升了居民福祉水平。而福祉水平最低的34号受访居民是来自箐口村、家里曾经经营过5年农家乐的26岁男性,在箐口村旅游发展最好的年份,家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且经济收入较好,但随着箐口村旅游业的没落,农家乐也停止营业且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由此,该农户对箐口村目前的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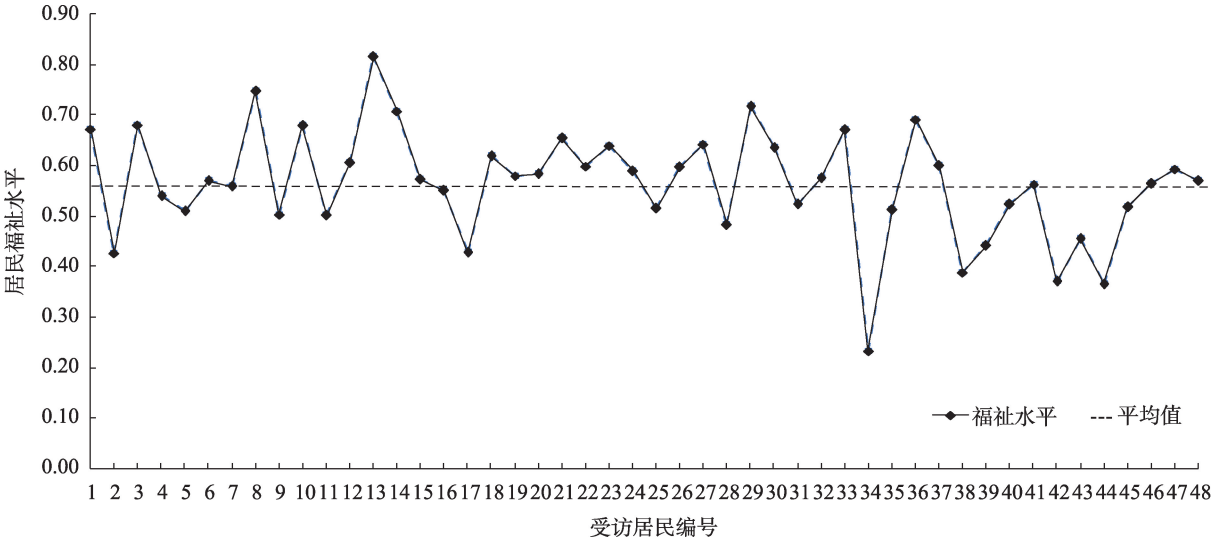

图2 受访居民福祉测度结果

Figure 2 Results of the surveyed residents' well-being

游发展、社区管理等评价较为负面,对于自身福祉水平评价较低。

3.1.2 不同特征居民福祉水平对比

根据已有文献[31,34,38,39],作为一种认知和感受,居民的福祉水平与其个体特征显著相关,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业、家庭年收入、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都会对自身福祉评价有影响。为分析农户居民个体特征对居民家庭福祉水平的影响,通过卡方检验(置信水平95%)分析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业、家庭年收入、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要素与居民福祉水平的关系。

(1)是否参与旅游业与居民福祉水平

为了探究"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业"是否会影响居民福祉,利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得到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表3)。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参与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在收入来源多样性、家庭收入满意度、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4个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在这4个方面,参与旅游业居民的均值都显著高于未参与旅游的居民。13号大鱼塘村居民(男,39岁,文化程度小学,参与旅游)说道:"之前出去打工,这边旅游一开发就回来了,在家里开农家乐差不多10年了,偶尔在外面接点工程,收入还算满意,我自己也种田,但都是自己吃,政府在客源和政策上也给了我们这些店一些支持,总体上还算满意。"大部分未参与旅游业居民

表3 不同参与旅游业情况卡方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chi-squar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test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题项	参与旅游业居民均值	未参与旅游业居民均值	显著性*P*值
年人均收入/元	12635.65	10908.56	0.49
收入来源多样性	2.74	1.93	**
家庭收入满意度	3.11	2.34	*
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的满意度	3.95	3.93	0.11
基础设施满意度	3.95	3.72	0.15
居住环境满意度	4.00	4.17	0.09
总体生活满意度	4.00	3.55	*
社区管理满意度	3.26	3.00	0.78
家庭及邻里关系满意度	4.16	4.45	0.08
教育资源条件满意度	2.68	2.66	0.08
学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2.63	2.55	0.91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满意度	3.79	3.72	0.86
医疗卫生条件满意度	2.68	3.07	0.12
医疗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3.21	3.03	0.61
治安状况满意度	3.89	4.03	0.34
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	3.95	3.66	0.25
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	2.74	2.59	0.06
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	3.95	2.62	***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非常不满意"赋值1,"不满意"赋值2,"没变"赋值3,"满意"赋值4,"非常满意"赋值5,下同。

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务农收入较低，参与旅游业居民的收入来源相比较丰富，收入也更高。而37号箐口村居民（女，32岁，文化程度小学，未参与旅游）说道："家里收入一般就是出去打打小工，家里种点田，刚够吃喝，对现在收入不满意也没办法。"总体来看，参与旅游业的居民，收入来源更多样，对自己家庭收入的满意度更高，对自己总体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同时也更看好自身留在本地的发展。

（2）家庭年收入与居民福祉水平

为探究家庭年收入是否是影响居民福祉的因素，利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4）。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的居民在年人均收入、总体生活满意度和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3个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的居民，年人均收入存在显著差异是必然的，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也会带来对总体生活满意度和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的显著差异。总体生活满意度呈现倒U型分布，家庭年收入8万元以上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最高，3万元及以下居民紧随其后，3~8万元的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低。而家庭年收入越高，对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反而越低。正如12号大鱼塘村居民（女，33岁，文化程度大专，参与旅游）所说："我现在开餐馆有3年了，餐馆一年毛收入30万~40万元，除去成本利润20万元，这个村子旅游发展一般，加上今年疫情的影响，来我们这边旅游的游客减少了，这对餐馆影响还是很大的。"

（3）年龄与居民福祉水平

为了探究年龄是否是影响居民福祉的因素，利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得到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5所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同年龄段的居民仅社区管理满意度1个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15~28岁和66岁及以上的居民对社区管理的满意度较低，"我一直待着这个村子里，也感受到村子里的一些变化，但在如何让老百姓提高经济收入方面，村委会他们基本上都是做政府安排的工作，没有能力带领村子旅游发展得更好"（25号大鱼塘村居民，男，70岁，文化程度小学，未参与旅游）。而41~65岁居民对社区管理满意度则最高，"我和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其他时候比如要种庄稼、遇到民族节日，我们就会回来，现在村子里管理得还挺好，交通出行、用水用电、生态环境都比以前好很多"（23号大鱼塘村居民，男，42岁，文化程度中专，未参

表4 不同家庭年收入卡方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the chi-squar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test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household annual income

题项	≤3万元组均值	(3, 5]万元组均值	(5, 8]万元组均值	>8万元组均值	显著性*P*值
年人均收入/元	3431.9	8620.49	12817.60	26011.90	***
收入来源多样性	2.29	2.45	1.93	2.44	0.59
家庭收入满意度	2.50	2.82	2.50	2.89	0.32
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的满意度	4.07	4.09	3.86	3.67	0.16
基础设施满意度	4.21	3.91	3.86	3.44	0.35
居住环境满意度	3.71	4.45	3.93	3.78	0.15
总体生活满意度	3.71	3.64	3.64	4.00	***
社区管理满意度	3.36	3.18	2.86	3.00	0.75
家庭及邻里关系满意度	4.43	4.09	4.29	4.56	0.88
教育资源条件满意度	2.71	3.09	2.64	2.11	0.09
学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2.57	2.27	2.64	2.89	0.94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满意度	3.64	3.82	3.71	3.89	0.17
医疗卫生条件满意度	3.00	2.82	3.07	2.67	0.18
医疗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3.29	2.64	3.29	3.11	0.88
治安状况满意度	4.07	3.82	4.07	3.89	0.56
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	3.93	3.73	3.71	3.67	0.92
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	3.00	3.00	2.43	2.00	***
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	3.29	3.45	2.93	2.89	0.20

表5 不同年龄卡方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the chi-squar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test for different ages

题项	15~28岁组均值	29~40岁组均值	41~65岁组均值	66岁及以上组均值	显著性*P*值
年人均收入/元	18147.62	13205.18	6802.70	8703.87	0.15
收入来源多样性	2.20	2.00	2.59	2.00	0.34
家庭收入满意度	2.50	2.65	2.65	3.00	0.15
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的满意度	3.70	3.82	4.18	4.00	0.15
基础设施满意度	3.30	3.88	4.00	4.00	0.45
居住环境满意度	3.80	3.94	4.47	4.00	0.32
总体生活满意度	3.60	3.65	3.82	4.00	0.83
社区管理满意度	2.40	3.12	3.65	2.50	*
家庭及邻里关系满意度	4.00	4.29	4.59	4.25	0.15
教育资源条件满意度	2.60	2.71	2.82	2.00	0.67
学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2.80	2.65	2.41	2.50	0.63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满意度	3.70	3.82	3.71	3.75	0.41
医疗卫生条件满意度	2.30	3.24	2.88	3.25	0.41
医疗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2.90	3.00	3.35	3.00	0.79
治安状况满意度	3.30	4.24	4.18	3.75	0.12
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	3.40	3.82	3.88	4.00	0.53
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	2.60	2.47	2.94	2.25	0.21
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	2.80	3.29	3.18	3. 25	0.71

与旅游)。因此,处于不同年龄段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管理情况的感知。

(4)受教育程度与居民福祉水平

为了探究受教育程度是否是影响居民福祉的因素,利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得到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表6)。结果发现,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

表6 不同受教育程度卡方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chi-square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test for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题项	小学及以下组均值	初中或中专组均值	高中、大专或本科组均值	显著性*P*值
年人均收入/元	9900.41	11221.43	22178.57	0.37
收入来源多样性	2.32	2.00	2.60	0.59
家庭收入满意度	2.79	2.53	2.20	0.68
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的满意度	3.86	4.13	3.80	0.94
基础设施满意度	3.79	3.93	3.60	0.72
居住环境满意度	4.25	3.93	3.80	**
总体生活满意度	3.21	3.53	3.80	0.93
社区管理满意度	3.82	2.87	3.20	0.78
家庭及邻里关系满意度	4.36	4.27	4.40	0.66
教育资源条件满意度	2.68	2.73	2.40	0.63
学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2.57	2.47	3.00	0.62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满意度	3.64	4.00	3.60	0.99
医疗卫生条件满意度	2.93	3.00	2.60	0.76
医疗费负担程度满意度	3.11	3.00	3.40	0.83
治安状况满意度	3.96	3.93	4.20	0.69
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	3.73	3.79	3.80	*
旅游发展情况满意度	2.61	2.80	2.40	0.84
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	3.11	3.27	3.00	0.90

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居住环境满意度、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2个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越低，对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满意度则越高，这说明随着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在旅游开发中尽可能保护当地遗产及传统文化的原真性。“我是觉得农业文化遗产一定得把它继续传承下去，田会继续种，田不会荒掉的，国家会发米的种子，鱼苗、鸭苗等一些福利政策，但是村里边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是农业文化遗产，因为文化水平太低理解不了，认知水平有限也会影响咱们这儿的发展，村民没有意识到遗产保护的重要性”（41号箐口村居民，女，19岁，文化程度高中，参与旅游）。因此，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居民对居住环境、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的感知。

3.2 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福祉影响的感知

本文依据问卷数据和访谈数据，基于福祉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教育资源、健康安全、保护和发展6个维度，从居民感知的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案例地社区居民福祉带来的影响。问卷中设计问题“旅游发展后，您觉得以下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差很多”赋值1，“有变差”赋值2，“没变”赋值3，“有改善”赋值4，“改善很多”赋值5，让居民对每一项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判断。如表7所示，各项指标的变化感知均大于3.00，且整体感知均值为3.68，说明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福祉影响持积极态度。

经济条件变化感知方面，收入来源多样性变化感知为3.50，家庭年收入感知为3.56。以上2个指标变化均值都大于3.00，说明总体来看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收入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旅游发展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例如居民经营餐馆客栈或到餐馆客栈帮工，能够丰富居民收入来源，促进居民收入增加。但是通过访谈发现，旅游发展带来的收入渠道增多和收入增加对参与旅游业的居民来说更为明显，21号大鱼塘村居民（男，39岁，文化程度初中，未参与旅游）说道：“参与了旅游做生意的比如开饭馆的，收入肯定增多了嘛，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旅游业对增加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开农家乐的收入比较高，也能带动村里其他人的收入。”

表7 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福祉影响的感知

Table 7 Residents’ perceived well-being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福祉维度	福祉指标	变化感知情况
经济条件	收入来源多样性	3.50
	家庭收入	3.56
生活环境	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	4.29
	基础设施建设	4.08
	居住环境	4.00
	总体生活	4.48
社会关系	社区管理	3.38
	家庭及邻里间关系	3.23
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条件	3.06
	学费负担程度	3.79
健康安全	医疗卫生条件	3.33
	医疗费负担程度	3.88
	治安状况	3.15
保护与发展	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	3.83
	旅游发展情况	3.48
	个人发展机会	3.85

生活环境变化感知方面，购买生活用品方便程度变化感知为4.29，基础设施建设变化感知为4.08，居住环境变化感知为4.00，总体生活变化感知为4.48。以上生活维度的4个指标变化感知均大于等于4.00，且高于整体感知均值，说明总体来看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这4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总体生活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访谈显示出居民们感受到旅游发展后村子的居住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当地政府不断完善村庄道路建设、路灯亮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雇佣专人打扫卫生、回收垃圾，并统一修缮房屋外观，优化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7号大鱼塘村居民（男，36岁，文化程度小学，参与旅游）说道：“因为旅游村子里绿化也多了，到处都花花绿绿的，村里路修了，路灯也修了，现在也不会停电了，出去买东西也方便了。我们房子的外墙是（按）旅游规划政府统一免费给做的，已经修过2次了，卫生方面提高很多，垃圾会有人扫，也会有车来收垃圾，现在的社会好。”

社会关系变化感知方面，社区管理变化感知为3.38，家庭及邻里间关系变化感知为3.23，虽然两个指标变化感知均大于3.00，但低于整体感知均值，说明总体来看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社区管理、家庭及

邻里间关系产生的影响较小,居民对社会关系变化感知不显著。41号箐口村居民(女,19岁,文化程度高中,参与旅游)说道:“我们村子村民们关系都蛮好,没有受到旅游的影响,村委会对村子的管理好不好,要看是谁当村长,这跟旅游没有什么关系。”

教育资源变化感知方面,教育资源条件变化感知为3.06,说明总体来看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教育资源条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学费负担程度变化感知为3.79,高于整体感知均值。基于居民访谈,学费负担感知增高的原因可能是旅游发展后居民与外界接触交流增多,更愿意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在教育上的花费有所增加,因此子女教育负担加重。如13号大鱼塘村居民(男,39岁,文化程度小学,参与旅游)说道:“没有感觉因为旅游发展而村子里的教育条件有什么变化,也没有觉得教育水平有什么提高。但是大家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人送小孩去镇上上学,送小孩去读幼儿园,我们家长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了,而且旅游发展后,我们普通话水平提高了。”

健康安全变化感知方面,医疗费负担程度变化感知为3.88,高于整体感知均值,但医疗卫生条件变化感知和治安状况变化感知较低,分别为3.33、3.15。总体来看,居民认为旅游发展略微改善了当地医疗条件,医疗费负担程度有所加重,当地治安状况则没有明显影响。医疗条件的改善体现在每个行政村村委会都有了卫生所,去医院的交通更方便了,还会有医生进村看病,但居民认为看病支出有所增加,正如23号大鱼塘村居民(男,42岁,文化程度中专,未参与旅游)说道:“看病比起以前方便很多,村委会有卫生室、游客中心那里也有医务室,去镇上的医院也都方便了,也有人会来村子里帮忙看病,但是感觉看病的开支变高很多。”

保护与发展变化感知方面,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情况变化感知为3.83,个人发展机会变化感知为3.85,均高于整体感知均值。说明总体来看,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这2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哈尼梯田首先是遗产区,遗产及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是重中之重,随着政府保护力度的加大,居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保护梯田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当地文化的保护意识有所提高,正如18号大鱼塘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男,41岁,文化程度小学,参与旅游)说道:“现在大家保护梯田、保护我们民族传统东西的意识更强了,因为政府会特别重视保护,要求我们保护好自己的田,我们自己的意识也有提高,作为一个哈尼山歌传承人,我觉得传统文化保护得比之前好了。”

在个人发展机会方面,居民能意识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个人发展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未来会有更多留在本地发展的机会,45号箐口村居民(男,28岁,文化程度初中,未参与旅游)说道:“未来如果旅游发展得更好了,愿意回来参与旅游业,有条件的话希望在这边开个农家乐,如果有钱了就想回家来发展。”

而旅游发展情况变化感知为3.48,低于整体感知均值,说明虽然居民对目前的旅游发展水平是比较不满意的,但居民也感知到当地旅游总体上是在稳步发展的。不过哈尼梯田旅游发展起步晚,交通不便等制约因素多,发展旅游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48号箐口村居民(男,75岁,文化程度小学,参与旅游)说道:“以前一开始开发旅游就是在箐口村,现在政府、公司不来投资了。要是以后政府公司重视箐口村旅游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们村子旅游发展肯定蛮好,这样也可以带动我们村子经济发展。”

4 结论、政策建议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教育资源、健康安全和保护与发展6个维度,客观和主观福祉2个方面,共18个指标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以云南省元阳县大鱼塘村、箐口村居民为案例地,对当地社区居民福祉进行了实证测度,并探讨了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对大鱼塘村、箐口村的居民福祉测度结果表明,居民间福祉水平差异较大,福祉水平最高的居民为0.85,最低的仅为0.23,其均值为0.56,旅游发展的参与水平和获益程度成为影响居民福祉差异的显著因素。

(2)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发现,居民的福祉水平

与是否参与旅游业、家庭年收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关联，说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存在异质性。其中，参与旅游业显著提高了居民福祉水平，因此在当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应拓宽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渠道与路径，也需要让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到自身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关键组分的重要价值。

（3）在社区居民视角下，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条件变化感知、生活环境变化感知和保护与发展变化感知整体评价较为积极，表明旅游发展会带来经济效益、扶贫效益、环境效益等积极影响。而囿于基础设施及区位条件的限制，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教育资源变化和健康安全变化的感知不显著。

4.2 政策建议

（1）当地政府要平衡农户生计策略转型需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大力引导、扶持和鼓励当地居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从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向多种旅游经营发展模式转变，通过旅游收益分配、转移支付等方式，引导居民利用自有资源，适度发展客栈餐馆、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旅游产业经营服务，进一步促进当地农户及农业社区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提升社区旅游参与获益水平，丰富居民收入来源渠道，从而提升居民福祉水平。

（2）针对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要在制度层面上合理制定旅游规划编制、旅游收益分红政策等，增加居民收入并强化居民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针对未参与旅游业居民提出的资金短缺、技术缺乏、知识水平不高等限制性因素，当地政府应提供小额贷款，放松贷款要求，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并为当地居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职业技能、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发掘多类型旅游增值服务。

（3）应明确当地政府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对居民的赋权和增权，在管理模式上重视社区参与，形成多利益主体权责明晰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管理机制；要加强财政投入，促进当地合理配置教育、医疗资源，促进城乡之间教育医疗的均衡发展；同时，要加强当地学校以及村级医疗机构建设，引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加强教师、医生人才队伍建设，改善配套硬件设施，提供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和更便捷的医疗服务，以促进旅游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居民福祉改善的共赢。

4.3 讨论

本文创新性构建了纳入保护与发展维度的社区居民福祉评价框架，通过综合分析定量的问卷调查和定性的农户访谈的研究结果，探讨了遗产旅游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福祉的多维度影响，并与前期研究进行对比分析[20,21,34-39]，进一步验证了该评价框架的合理性、有效性与适用性，在理论及实践层面上推动了旅游情境下的社区居民福祉研究。

本文根据调研实际情况选择了能够测评社区居民福祉的变量，以期较为全面的表征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福祉特征。现有指标体系以居民的评价为主，客观福祉测评指标较少，后续研究中可在本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全面地选择主客观指标进行居民福祉的测度。此外，囿于时间及人力的局限，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文居民调研样本量有限且以一次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适当增加调研样本量，对更多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在较长时间段内持续跟踪社区居民福祉的变化，更全面地探讨总结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对社区居民福祉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刘某承, 苏伯儒, 闵庆文, 等. 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运行机制与实施路径[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4): 551-558. [Liu M C, Su B R, Min Q W,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approach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4): 551-558.]

[2] 孙业红, 武文杰, 宋雨新.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2): 133-142. [Sun Y H, Wu W J, Song Y X. Study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2022, (2): 133-142.]

[3] 章琳丽, 白祥. 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研究: 以新疆奇台旱作农业系统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7): 87-91. [Zhang L L, Bai X. A study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dry crop agricultural system in Qitai, Xinjiang[J]. 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Technology, 2021, 32(7): 87-91.]

[4] 苏明明. 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 社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9. [Su M M.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ultiple Case Studies from the Community Perspective[M]. Beijing: China Tourism Publisher, 2019.]

[5] 田里, 刘亮. 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机理研究: 以云南普者黑旅游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1, 41(1): 22-32. [Tian L, Liu 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islanding effect: A case study of Puzhehei Tourist Attract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 22-32.]

[6] 苏明明. 旅游地社区研究: 从生计到福祉的理论拓展[J]. 旅游导刊, 2021, 5(6): 1-23. [Su M M. Tourism and community research: From livelihood to wellbeing[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spects, 2021, 5(6): 1-23.]

[7] Li J Y, Pan L, Hu Y. Cultural involve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Examining serial mediation effects of residents'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place attachment[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1, DOI: 10.1016/j.jdmm.2021.100601.

[8] 郗家祺. 农民福祉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关系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8. [Xi J Q. The Analysis of Affecting Factors of Farmers' Well-being and the Coupling Analysis between Farmer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8.]

[9] 李魁明, 姚罗兰, 石云, 等. 黄河流域城乡居民福祉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 生态经济, 2022, 38(11): 222-229. [Li K M, Yao L L, Shi Y, et al. Estimate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J]. Ecological Economy, 2022, 38(11): 222-229.]

[10] 张爱平, 张姣姣, 张永勋.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哈尼梯田为例[J]. 旅游科学, 2020, 34(3): 1-18. [Zhang A P, Zhang J J, Zhang Y X.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farmland at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Hani Terraces[J]. Tourism Science, 2020, 34(3): 1-18.]

[11] 李琳婕, 童磊, 周荷芳, 等. 共同富裕视角下浙江省农户主观福祉测度及优化策略[J]. 浙江农业科学, 2022, 63(10): 2228-2233. [Li L J, Tong L, Zhou H F, et al.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J]. Journal of Zhejia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22, 63(10): 2228-2233.]

[12] Chen Y, Cottam E, Lin Z B. The effect of resident-tourist value co-creation on residents' well-being[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DOI: 10.1016/j.jhtm.2020.05.009.

[13] Hung H K, Wu C C. Effect of adventure tourism activiti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DOI: 10.1016/j.annals.2021.103147.

[14] Dwyer L.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dent well-being[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2, DOI: 10.1016/J.TMP.2022.100996.

[15] 梁秀琴, 冯强, 段宝玲. 晋西黄土高原矿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空间耦合特征[J]. 水土保持通报, 2022, 42(6): 400-408. [Liang X Q, Feng Q, Duan B L. Spati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at mining area of Loess Plateau in Western Shanxi Province[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22, 42(6): 400-408.]

[16] Lindberg K, Munanura I E, Kooistra C, et al. Understanding effects of tourism on residents: A conting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approach[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2, 61(2): 346-361.

[17] 黄志刚, 黎洁. 乡村旅游征地对失地农户福祉的影响: 基于PSM模型的检验[J]. 资源科学, 2021, 43(1): 171-184. [Huang Z G, Li J. Influence of land acquisition for rural tourism on the well-being of landless farmer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SM model [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 171-184.]

[18] 李鑫远, 雷敏, 郗家祺, 等. 生态移民福祉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陕西省蓝田县农村抽样调研[J]. 地理研究, 2018, 37(6): 1127-1141. [Li X Y, Lei M, Xi J Q, et al.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under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sampling survey of rural areas in Lantian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6): 1127-1141.]

[19] 张金荟, 张宏梅. 近10年国内旅游幸福感研究进展[J]. 旅游研究, 2021, 13(5): 88-98. [Zhang J H, Zhang H M.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tourism well-being in recent 10 years[J]. Tourism Research, 2021, 13(5): 88-98.]

[20] 曹新光. 基于微观视角下旅游发展对农户家庭福祉的影响研究: 以大别山区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16, 55(20): 5398-5402. [Cao X G.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 welfare based on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aking Dabie Mountains Area as an example[J]. 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6, 55(20): 5398-5402.]

[21] 杨涛. 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福祉影响研究: 以陕西省金丝大峡谷旅游社区为例[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2. [Yang T.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Well-being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Example of the Jinsi Grand Canyon Tourism Community in Shaanxi Province[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2.]

[22] 黄克己, 张朝枝, 吴茂英. 遗产地居民幸福吗? 基于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案例分析[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122-132. [Huang K J, Zhang C Z, Wu M Y. Are residents at heritage sites happy?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ro-poor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s[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1): 122-132.]

[23] Su M M, Sun Y H, Wall G, et al.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ourism and community livelihoo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Xuanhua Grape Garden, Hebei Province,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25(3): 205-222.

[24] Woosnam K M, Russell Z, Ribeiro M A, et al. Residents' pro-tourism behaviour in a time of COVID-19[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30(8): 1858-1877.

[25] Pui S T, Chun K L, Zhai T Q. Investigating the bidirection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DOI: 10.1080/09669582.2022.2071911.

[26] 徐虹, 于海波. 大健康时代旅游康养福祉与旅游康养产业创新[J]. 旅游学刊, 2022, 37(3): 10-12. [Xu H, Yu H B. Tourism and recreation well-being, and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dustry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great health[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3): 10-12.]

[27] 李琪辉, 刘长庚, 王宇航. 数字金融能否显著提升居民福祉[J]. 财经科学, 2022, (9): 30-42. [Li Q H, Liu C G, Wang Y H. Can digital fina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J]. Finance & Economics, 2022, (9): 30-42.]

[28] 赖斌.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民生感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7, (5): 112-115. [Lai B.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the sense of livelihood in ethnic areas[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7, (5): 112-115.]

[29] 朱麟奇, 李秋雨, 刘继生. 中国旅游业与地区发展及民生改善协调关系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8): 1328-1335. [Zhu L Q, Li Q Y, Liu J S.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8): 1328-1335.]

[30] 武文杰, 孙业红, 王英. 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居民旅游参与的情感响应: 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J]. 旅游学刊, 2022, 37(4): 128-139. [Wu W J, Sun Y H, Wang Y.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response of female residents' tourism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rice-fish culture[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4): 128-139.]

[31] 唐晓云, 闵庆文, 吴忠军. 社区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居民感知及其影响: 以广西桂林龙脊平安寨为例[J]. 资源科学, 2010, 32(6): 1035-1041. [Tang X Y, Min Q W, Wu Z J. An investigati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n agro-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Ping'an Village of Guilin City, Guangxi[J]. Resources Science, 2010, 32(6): 1035-1041.]

[32] 肖沁霖, 肖黎明. 居民福祉视角下城市生态治理效率的溢出效应: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检验[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5): 149-155. [Xiao Q L, Xiao L M.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ecologic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Based on the tes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1, 40(5): 149-155.]

[33] 裴玮. 基于熵值法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16): 119-122. [Pei W.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ity'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entropy value method[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0, 36(16): 119-122.]

[34] Nian S F, Liu F J, Chen M, et al. Satisfaction of tourism communities in world heritage sites based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Study area of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Park, PRC[J]. Sustainability, 2022, DOI: 10.3390/SU15010533.

[35] 武晓英, 李辉, 周彬.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区居民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影响研究[J]. 山地学报, 2021, 39(2): 275-289. [Wu X Y, Li H, Zhou B. Impac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J]. Mountain Research, 2021, 39(2): 275-289.]

[36] 曾芳, 钟永德. 生态旅游影响下女性居民社会网络的规模、连接与结构: 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11(2): 283-299. [Zeng F, Zhong Y D. Social network scale, connection, and structure of female residents influenced by ecotourism: A case of Wulingyuan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J].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1, 11(2): 283-299.]

[37] 韩磊, 乔花芳, 谢双玉, 等. 恩施州旅游扶贫村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J]. 资源科学, 2019, 41(2): 381-393. [Han L, Qiao H F, Xie S Y, et al. The differe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impact in Enshi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villages based on PCI[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2): 381-393.]

[38] 谢双玉, 李琳, 冯娟, 等. 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究: 以恩施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2): 80-92. [Xie S Y, Li L, Feng J, et al.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or and non-poor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erformance in Enshi[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2): 80-92.]

[39] 谢峰, 明庆忠, 侯兵. 居民感知视角下遗产地旅游空间生产研究: 以江苏省无锡市南长街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4): 131-136. [Xie F, Ming Q Z, Hou B. Research on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of heritage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Nanchang Street in Wuxi City, Jiangsu Province[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2, 41(4): 131-136.]

Influence of heritage tourism on th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Hani Rice Terraces of Yunnan Province

SU Mingming[1], WANG Menghan[1], YU Jingjuan[2], JIN Min[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hengdu Xindu District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Chengdu 6105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represent the harmoniou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developed through long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s. With residents as the key stakeholder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s among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owcase the high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tourism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refore, exploring tourism impacts on residents' well-being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Methods**] This study took Dayutang and Qingkou Villages of Hani Rice Terraces in Yuany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case study sites. An evaluation index with a total of 18 indicators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residents' well-being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cluding six dimension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living environment, social relations, educational resources, health and safety, 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residen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qualitativ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ngaged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tourism impacts on residents' well-being.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in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varied greatly,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well-being at 0.8516 and the lowest at 0.2321, and the mean value was 0.5641. Second, factors such a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age of residents, and education level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Third, this study examined heterogeneity in the perceived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residen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Perceived changes in economic condition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However, perceived change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health and safety had in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residents' well-being. [**Conclus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encourage the intergration of new livelihoods to local residents'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and enhanc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thus striving to achieve a balance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Key words: residents' well-being; heritage tourism;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entropy method; Chi-square test; Hani Rice Terraces